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近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点

<http://www.fristlight.cn> 2005-06-29

[作者] 张中良

[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摘要] 近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点: 现代文学研究向当代延伸的趋势更为明显, 从“现代”到“当代”的转折期得到关注; 台湾、香港文学被自觉地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予以关注; 探究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联系; 通俗文学研究在争鸣中向前推进; 经典重读多有收获; 现代文学的史料学、文献学问题得到高度重视; 文化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 台湾文学; 香港文学; 外国文化

一、总结海外汉学影响的经验教训新时期以来, 海外汉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认真总结这种影响的经验教训已成为前沿课题。聊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讨会就对“新时期以来海外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进行了专题研讨。报刊上也能见到这方面讨论的反映。如《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刊出的《海外学者冲击波》, 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师生关于海外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响的讨论。程光炜认为,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海外学者热”的兴起, 有其自身原因: 其一, “理论热”在美国学界久盛不衰, 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大行其道, 对这批学人重新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二, 由于美国文化的异质性所产生的压力, 在海外学者那里培育出一种“后革命”的特殊语境, 从而形成了“再解读”的研究视角, 从中可以看到海外学者的共同性。诸如,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 文学批评常常杂糅了政治理论、哲学思辨、历史研究、心理分析、社会学资料、人类学考察等话语传统和论述方式。同时, 海外学者存在代际之间、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性。不同学派各有所长, 能够给我们以启迪; 但亦有所短, 应该予以注意。程光炜指出, “再解读”主要是研究文学史、作家作品的一种理论姿态, 而不是研究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有效方法。在进行这项工作时, 不能只以“新”、“奇”出胜, 还应有审慎的查勘、分辨、比较和推敲, 把“再解读”建立在认真踏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黄修己《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把源自西方的“全球化语境”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思考认为, “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在于经过很长的历史过程, 形成一种全人类认同的价值观——全人类性。今天, 从全人类性的视角研究现当代文学, 可以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性内涵, 既有利于发挥现当代文学在“人”的启蒙教育中的作用, 也有利于世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二、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意识愈加清醒“断裂”意识逐渐被历史意识所取代, 在作家、作品、文体与思潮等方面全方位地探讨现代文学与从先秦到近代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联系。这方面代表性的论文有陈方竞《鲁迅小说的“魏晋情结”: 从“魏晋参照”到“魏晋感受”》、黄乔生《鲁迅、周作人与韩愈》、胡元翎《鲁迅与龚自珍》、束景南和姚诚《激烈的“猛士”与冲淡的“名士”——鲁迅与周作人对吴越文化精神的不同承传》、董乃斌《废名作品的文学渊源——以与李商隐的关系为中心》、王兆胜《林语堂与公安三袁》、倪婷婷《“非孝”与“五四”作家道德情感的困境》、刘保昌《道家思想与现代文学的个人主义精神》、龚敏律《论沈从文〈月下小景〉集对佛经故事的重写》等。现代文学研究向当代延伸的趋势更为明显, 从“现代”到“当代”的转折期得到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辟有“‘十七年’文学研究”专栏, 刊出萨支山《“故事”“与”抒情“: 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说的两种可能性》、孙先科《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董之林《传统叙事方法的重现与再造——关于50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等。这一时段在20世纪文学史上相当重要, 关涉到五四新文学的走向、变异与共和国文学的发生、发展, 其中有承续也有断裂, 有扬弃也有创新, 是非功过值得深入研究。赵园、钱理群、洪子诚、吴晓东、赵京华、吕晴、赵稀方、杨联芬、段美乔等人的笔谈, 观点见仁见智, 浓厚的历史感、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研究问题的方法给人以启迪。《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也推出《20世纪40-5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笔谈》, 围绕着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与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两本研究转折期的著作展开话题。愈益清醒的历史意识还表现在以往遮蔽或模糊的文学现象的历史还原之中。胡博《新月派前期的“文学梦”》、吴敏《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刘增杰《一个被遮蔽的文学世界——解放区另类作品考察》等, 在发掘、爬梳大量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上, 呈现出历史原生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三、台湾、香港文学被自觉地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予以

关注赵稀方《视线之外的余光中》及相关文章，对“余光中热”有所质疑，在两岸文坛激起强烈反响。台湾出版的《爪痕与文学》刊发了“余光中风波在大陆”特集，收录赵稀方、吕正惠、陈漱渝、陈子善、杨若萍、钱虹、刘心武、薛永辰、黄维樑、余光中、陈映真等人的文章。两岸学者、作家参与论争，至少可以说明台湾文学确已纳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少现代文学学者涉足台湾、香港、澳门及域外华文文学研究。赵稀方《一种主义，三种命运——后殖民主义在两岸三地的理论旅行》等论文，在准确把握后殖民主义原典产生的语境及其原意的前提下，认真辨析其在两岸三地的不同流变，批评有的台湾学者偏颇地借用后殖民主义为“台独”鼓吹的观点与方法，表现出敏锐的理论感悟与坚定的学术立场。本年度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黄万华《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王德威《原乡想像，浪子文学——李永平论》、王岳川《澳门文化与文学精神》等；专著有方忠《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彭耀春《台湾当代戏剧论》。前者既有历史发展总论，也有小说、诗歌、散文、通俗文学的论述，后者则是戏剧的梳理与论述，合起来大致反映出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四、探究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联系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方长安《形成、调整与质变——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等，著作有王福和主编《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作家》、吴定宇《抉择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靳明全《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等。尤为可喜的是对翻译文学的价值愈益被看重，认为翻译文学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翻译文学的研究明显加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鲁迅研究20年”等学术讨论会上，翻译文学都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了一批现代翻译文学的研究成果，如李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郑海凌《“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鲁迅译学思想探索之二》、秦弓《鲁迅与有岛武郎——以“爱”为中心》、《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刘进才《阿左林作品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杨迎平《施蛰存的翻译工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张德明《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等。五、通俗文学研究在争鸣中向前推进近年来，对于通俗小说与旧体诗词是否应该纳入现代文学研究框架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已有现代文学学者在通俗小说与旧体诗词的研究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已有不止一种文学史著作将其纳入框架之中。汤哲声的专著《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梳理出20世纪流行小说的发展脉络：民初的海派文化新闻文体（言情小说、黑幕小说），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繁荣与变革（社会言情小说、国难小说、人性的张扬、模式变革），40年代的新旧交融（新市民小说、新浪漫主义），80至90年代的价值回归和文本创新（纪实小说、官场小说、新新人类小说、历史小说、网络小说）；选择57部代表作予以文本分析后指出，两种类型虽然仍会继续下去，但其交融与互动使得它们的美学界限会越来越模糊。虽然关于流行小说的界定或可讨论，如将阎真的《沧浪之水》列入其中，而将发行量极大的《红岩》等“红色经典”排除在外等，都易引起质疑。但纵览百年文学史，该项研究梳理出一条线索，并指出与高雅小说的关系，确有创新之处。值得注意的还有作为此书序文的范伯群《建立生态平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另一方面，也有对通俗小说的批评之声。袁良骏《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编〉的误评误导》，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武侠党会编》的评价提出批评，认为“三亿言的武侠小说，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大灾难。它的泛滥成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严重教训。”但袁良骏亦有《鲁迅的七封信和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肯定宫氏“在武侠世界开辟了一片较新的天地，吹来一股清新的气息”。看得出来，袁良骏并非对通俗文学一概否定。六、经典重读多有收获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及延传的历史进程，认为经典既是实在本体又是关系本体，它具有原创性、开放性、多元性、典范性、民族性、历史穿透性及巨大的阐释空间，因而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意识形态、精神价值以及知识、审美诸系统的变化与整合促成了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革命化与审美化、民族化与现代化、大众化与精英化三对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延传的不同路向；而新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与反思，则展现了现代文学经典在延传中变异和重构的发展趋势。秦弓的《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在重新确认经典、建构文学史、面临种种挑战尤其需要确认现代文学的价值等方面，论述了重读经典的必要性，并指出在历史还原、文化还原与多元解读、尤其是审美分析方面，经典重读具有广袤的空间。程光炜《“鲁郭茅巴老曹”是如何成为经典的》，以“鲁郭茅巴老曹”被确立为经典的个案，说明文学史编撰对经典“型构”的作用，同时又认为在历史进程中，他们是活生生的个体，应该“设身处地”地加以研究，才能有利于问题的展开与进入。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的世纪之谜》，王科《“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张洁宇《鲁迅作品中“路”——意象分析之一》、何平《〈故乡〉细读》、洪玲《论萧红笔下的太阳意象》等论文，在经典细读方面均有独到之处。七、现代文学的史料学、文献学问题得到高度重视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重视史料的好传统，从现代文学先驱者胡适、鲁迅、郑振铎、朱自清，到学科的重要创立者王瑶、唐弢、李何林等，都很重视史料工作。马良春、樊骏等发表过关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长篇论文，倡导并推动这项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3套大型丛书；还有朱金顺的《新文学史料引论》和一些作家全集、文集、名著校勘

本。现代文学界在强调理论创新的同时，对史料工作有所忽略。学术界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把史料与学风、方法问题一并列为议题。《文学评论》与河南大学文学院等联合举办题为“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研讨会。清华大学中文系等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把文献问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并讨论达成加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抢救的共识，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2004年，出版了一批史科学、文献学成果，如贾植芳、陈思和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刘福春撰述的《新诗纪事》等。在文献学研究中，金宏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尤为突出。该书选取了《家》、《子夜》、《骆驼祥子》、《创业史》等8部名著，对校其不同版本，探讨版本变迁的历史原因与修改的短长。

八、文化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在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区域文化、教育文化、出版文化等与现代文学的互动与交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代表性专著有朱晓进等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雷世文《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三十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论文有盛英《冰心和宗教文化》、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刘勇《〈空山灵雨〉：融合多重宗教文化的人生寓言——兼与〈野草〉、〈画梦录〉比较》、袁国兴《宗教意识的链接与文学的选择——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一种解读》、朱庆华《许地山小说宗教色彩的显与隐》和方长安、王本朝、王桂妹题为《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笔谈等。作家研究、社团流派研究、文体研究与接受美学研究等方面也有可喜的成果，如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阎奇男《“爱”与“美”——王统照研究》、黄淳浩《创造社通观》、阎庆生《晚年孙犁研究》、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等。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